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7年
诗歌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张清华

- 21SHIJI
- ZHONGGUO
- WENXUE
- DAXI
- 2007NIAN
- SHIGE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7年
诗歌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张清华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 张清华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年诗歌 / 张清华主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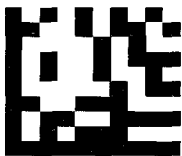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287-9

I. 2… II. 张…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00154号

春风文艺



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
至10658028访问网站

使用方法: (移动用户)

方法一: 直接上网。

编写短信“800024”或“春风文艺”发送至
“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方法二: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

发送短信“A”至“10658028”,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
链接, 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 打开软件,
扫描二维码或输入“800024”或“春风文艺”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 无信息费, 咨询电
话 10086。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购书热线 024-23284038)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常 晶 黄 梅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93千字
印 张	12 插页 2	印 数	1—7000册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3287-9	定 价	24.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

张清华

当我在 2007 岁末暗淡的光线中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惆怅远多于兴奋。除了短期内大量阅读所带来的情绪的混沌与感受的拥堵，大约还有些许岁末的凄惶。毕竟置身这时间的废墟，心中不只是溢满了农夫一样的喜悦。

与去载的热闹相比，2007 年也许是一个安稳平淡的年头。至少，这一年中的闹剧与噱头已大大减少，没那么多爆炸性的事件。我不是美学领域中的进步论者，所以说不上这是必然还是偶然，但总不至于认为天下已从此太平，权当它是喧闹间隙里的一个疲劳期吧。总归这是一个“好诗”多于“痕迹”的年份。这对喜欢和习惯于偷懒的编选者来说可是一个考验，因为我一直主张该选本的原则是“记录诗歌的历史痕迹”，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搜寻“最美的诗篇”——所谓“大系”与“年度最佳”的区别，应该是在这里。的确，编选“标记性”或者“极限式”的文本是相对容易的，在众多的作品一眼便可以看见它们，只要不是淫邪凶恶之作，就可以悉数收入；但什么是“好诗”，怎样才算是“最佳”，就是比较容易有异见的事情了。因此我不得不由于“道德”

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避开某些很有“痕迹意义”的作品，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那些看起来干净和唯美的篇章；同时又深恐各种缘由会把这样一个选本彻底变成一个平庸之物：一首首单个的文本是好的，但编成一本书，就变成了一个平庸的年选。对于将来的诗歌史叙述来说，似乎并没有增加什么有意思的新材料。只不过对诗歌来说，这或许也是好事，因为真正的好诗，未必是以怪异和极端见长的。

也因为这样一个理由，我决意抛开“年度审计”式的工作角色，因为对该年度的诗歌史来说，一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的事件，二则那样的文字也决然是速朽的。因此，与其说一番皮毛现象，不如谈几个问题，即便不能深入，也至少求些观察的距离，和稍整体些的眼光。

一 诗歌经验：在整体的迁移之中

某种意义上，文学经验世界的空间转换，比起工业革命的速度来要缓慢得多。农业时代的诗歌经验在我们这个民族里，是以音韵的和谐节律，形式的整饬完美，形象的优雅高贵，情感的士大夫式的美丽颓丧等等为经典特征的，这些特征一直滋养着汉语，支持并培育了中国人的审美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固化的美感范畴与观念体系。它的改换，某种程度上比“推翻帝制”还要困难得多，所以当20世纪的历史结束，中国已经部分地走上了现代之路，物质形态的文化已经面目全非之时，有关中国现代的诗歌向何处去，却似乎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我参加今年冬季在珠海举行的“第二届广东诗歌节”的时候，忽然产生了类似的问题冲动。其实，由政府埋单把诗歌节变成地方“文化工程”的做法也不是广东独有，这不是我思考的重心，我所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广东这样一个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城市化进程最快，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复杂因素最多

的地方，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混合式”诗歌事件与文化景观？出现了这样密集的有来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专业和非专业的、出生本土和漂泊异乡的、兼做商贾官员或者身居底层的写作者？也出现了大量书写工业区的物质景观、人的生存体验与心理创痛的作品？很显然，这两者之间不是没有内在关联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生存经验的巨大转换，催生了丰富的当代性诗歌资源，正是这些纷繁而本没有“诗意”的经验，在激励和折磨着这里的生存者们，促使他们为自己寻找某种“精神安居”的理由与灵魂栖息的支持。

因此问题需要追根溯源，我们要检验一下，中国现时代的诗歌经验能否实现和是否实现了结构性的转换——由农业时代乡村经验的审美形态，转换为工业时代的城市经验支持下的现代的审美形态？这个过程已历时太久，现在可以说还在路上、在较量与彼此消长中。上世纪 20 至 30 年代中国的上海，也曾有一批以“大都会”、十里洋场和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为自己书写对象的诗人，但那些东西很快便被农业时代经典的诗歌经验所重新淹没。从李金发的陌生和充满震撼感的“弃妇”，到戴望舒笔下忧郁又令人熟谙的“丁香一样的姑娘”，似乎可以看到农业时代审美经验在现代中国的微妙转换与“复辟”，她似乎具有了“小资”的气质，但终究又是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想象与趣味。中国现代诗歌的确立，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业文化经验在白话语境中的重新确立为条件、为结果的，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北方》《我爱这土地》一类作品，与新诗的合法化进程是密切联系着的。随后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台湾，曾首先爆发了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运动”，出现了少许以怪异、畸形和文明异化为内容特征的都市场景，但随后就又经历了一番乡土文学运动——70 年代的乡土诗歌回潮，再一次表明了农业文化经验的根深蒂固。至于 50 年代以后的大陆，官方在诗歌发展方面所给出的明确无误的出路是“古典加民歌”，现代城市经验是匮乏和基本被排除的。80 年

代诗歌的复兴运动，朦胧诗经典的抒情模式，它所使用的大量唯美色彩的意象，可以说仍然基于传统农业时代的经典经验形态。至于现代城市经验，只有到了80年代中期的“生活流诗歌”和稍后的“第三代”，似乎才开始逐渐和全面地取代传统的乡村经验模式，但随后就出现了海子——被称为“最后的农业乌托邦”的书写……

上面这个粗略的回顾当然不能确切地说明问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在最近的这些年里，这样一种分野和转换，确已加快了速度，并且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我们不是以这样的背景来看待如今诗歌的复杂多样和陌生化状况，那么将不会找到合理和正确的答案。

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个天然的悬殊：农业时代的诗歌审美经验是和谐与优雅的，而工业时代的诗歌审美经验则一变而成为了畸形、粗鄙、世俗或丑恶的东西。波德莱尔式的书写为什么成为一种震撼和惊悚性的诗歌经验，成为“现代性写作”的开端，其原因就在这里。它彻底打碎了浪漫派诗人对古典诗歌美感与经验的登峰造极的发挥，开辟了一个幽暗而诡秘、恐怖和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建立在现代城市的文化分裂的基础上的，其标志——按照瓦尔特·本雅明的说法——是大量游走在城市缝隙和边缘处的“浪荡游民”的存在。这些人以类似于波希米亚密谋者的身份、无产者和流民的身份出现在巴黎的街头，才替换了人们关于这座城市原有的想象，催生了波德莱尔式的阴冷而诡谲的诗歌意象。一句话，经验的主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变更，它不再是中产阶级以上人群的素养和特权。底层的游走者与边缘人、流浪汉，文化体系中危险的叛逆者与出走者们，成为了最有前卫性与生命力的写作主体。

现代性的审美经验也正是缘此而遭到了抵制，当它化身为丑与畸形的事物、乱音与不和谐的节律之时，这种抵抗就变得更加顽强和合理。这正是当代中国诗歌充满畏途与陷阱的真正缘由。

这当然不能说是线性意义上的“进步”，但同时也不能说是诗歌的“末路”与衰亡，在各种关于诗歌的危机预言和责备声中，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内在的误解与起因。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在最近的若干年里，诗歌确实正在从黑暗和宽广的土地，迁移到灯火斑斓的楼群城市之中，从优游从容的唯美形象，转移为冰冷破碎的生存体验，几乎所有新的变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几乎都可以放在这样一个范畴中来审视。比如这几年从广东和“南方”弥漫而来的、被社会道义与伦理诉求折光了的“底层生存写作”，看起来当然首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范畴，但当我们将放在更辽远的时间标尺上来看的时候，它可能正在变成广义的现代与城市经验的一个常态与组成部分。类似郑小琼那样的诗歌，绝不仅仅是个体处境的写照，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感悲愤，它是对“铁”一样冰冷的现代性生存经验的普遍性揭示，这样一种揭示，虽然也伴随着对时代的批判和一种更久远的悲伤感叹——这使它们充满力量，但“铁”的意象的反复出现与被咏唱，却昭示了它与传统诗歌经验之间的分野。换言之，它也许就可以看做是目下中国前现代的资本积累与后现代的精神生存相混合的产物，以及最形象生动的隐喻：尖利、冷酷、荒寒、生硬，还有破碎、隔膜、困守和湮灭的属性，这是包含了客观世界的具象、同时又包含了主体精神感受的生动象喻——

在炉火中歌唱的铁，充满着回忆的铁
它的低音或者高音，疼痛而尖锐的生活
它的方言披着春天的炉火与秋天的雨水
这烙红的光泽，让生活慢慢磨损
熄灭，那个在炉火中坐着的年轻人
唱着歌谣……

海子笔下的那个来自乡村的游子，那棵“空气中的麦子”，

那个热爱着土地并且“倾心于死亡”的“野蛮而悲伤的海子”，正在变成流水线与工业区里无望而无根的追忆者，他或者她，正在漫长乃至一生的“回忆”中由泥土慢慢转变成铁，包括他的心灵、情感与经验方式。如果要书写一部当代诗歌美学的历史，这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笔，或者也可以说，要书写一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史与精神史，这也绝对是最富巨变色彩的一笔。

还有另一部分来自城市生存者的痛切感受。我在前一两年的《序》中也曾提到一本来自上海的民刊《活塞》所带给我的震撼，他们所书写的十分具有人类忧患感的、病态和陌生化的、以“骷髅”与鬼魂为感受主体的、充满惊悚与恐怖感的诗歌，具有巨大的文明隐喻意义，我曾把这些诗歌所代表的一种感受与经验方式叫做“工业时代的新美学”，现在我更加清楚，这种工业时代的新美学正和波德莱尔式的阴暗与晦涩，“未来主义者”式的激进恍惚与暴力主义的变体、“垮掉的一代”式的夸张的道德堕落等等现代主义美学一起，构成我们时代的一种混杂而不可逆的潮流。在我们的社会急剧分化的情势下，它向着道德觉醒的一面生长出“关注底层”与道义责任的一极；向着个人主义与自由冲动的一面又奔涌出一股粗鄙与喧嚣的浊流。在这样的一个视野中，来看新生一代的网络诗歌写作、70后和80后一代中粗鄙化的美学趣味，看那些比较极端的“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等现象，也同样会找到一个宏观化的条件与背景。

这当然不是一个“文学激流永远向前”的乐观预示，很显然，巨大的楼宇可以在几年内建成，而现代人的文明与经验的成型，城市文化形态美感的被接受，却是一个比一代人的成长更漫长的过程。这个处理的方式与过程，正如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城市对中国人来说所抱有的那种天然的陌生感一样，是需要悉心的体味与选择的，而它所产生的新鲜与粗鄙、活力与丑陋、合理与破坏性的矛盾性质，是要经过反复的斗争、磨合、激扬与沉淀的。

二 诗歌中的文化地理

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问题，这里只能从一些侧面来谈。如果仅从表面上看，诗歌中的文化地理问题似乎正在消失，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写作者的地域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化了。但中国是如此之大，地区之间文化与社会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某些文化上的差异性也还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从80年代的“第三代”运动开始，当代中国的诗歌格局就具有了鲜明的地理性质，形成了许多带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诗歌群落。世纪之交以来，随着民间经济力量与文化空间的迅速发育，大量诗歌民刊和随之出现的诗人群落又在各地活跃起来。两三年以前，我曾借助《上海文学》开设的“当代中国民间诗歌地理”的栏目，对这些民刊与群落现象做了部分的梳理，虽然只是一个“观察”而谈不上研究，但至少使我本人对“诗歌地理”这样一个概念有了一些深层的感受与理解。它使我意识到：文化的地域属性对诗歌的写作趣味、美感风格乃至语言与修辞方面的差异性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这也是诗歌艺术的良性文化生态的基础与保障。在川南与贵州莽莽苍苍的大山中的《独立·零点》，与和风细雨的杭州西湖边上的《北回归线》、静谧古雅的燕园学府中的《发现》相比，来自小兴安岭冰封雪原的《东北亚》与风光旖旎的南国热带的《诗歌与人》，以及在同样纬度但却自成一系的《自行车》相比，其共同之处除了都是“使用汉语”书写以外，恐怕并不比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诗歌的一致性更多，甚至它们所共同使用的“汉语”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修辞上、在语法甚至是在词语的构成上，其差异性也并不比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更少。

但这里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谈诗歌中的文化地理问题，比原来的地理概念更大、也更笼统一些。比如说广东，这几年来很

大一部分诗歌动静是这块“热土”上闹出来的，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以往传统的“诗歌大省”，是类似四川这样富有文化积淀与诗歌传统的地域，而广东则属于“市场意识形态”统领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地域，精神性的东西在这里不会有很大的市场。然而在最近的几年中，它却一跃而成为了诗歌最“繁盛”的地区，这里不仅有因为其领先的民间经济力量而导致的最正规和豪华的诗歌出版物，包括个人文集、诗歌合集、地方文联印行的诗歌报刊、民间同人诗刊等等，而且还冒出了如此众多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写作者，所谓“打工文学”、“打工诗歌”也是在这里兴起并引发关注与争论的。如今这块土地上可以说生存和栖居着人数最为密集的诗人，在这里，由政府主办的“广东诗歌节”已经举办了两届，民间举办的各种诗歌活动也名目繁多，其诗歌内部的文化结构如同这里奇特的经济结构一样，官方、民间、个人有机缠绕在一起，在市场力量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有一个奇妙的磨合，这种奇特的模式构成了当今中国文化生产的一种典型景观和特殊机制。尽管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但却远没有在广东这样完善、有机和有效。

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工业社会的发达带来的都市化和前现代景观给写作与生存者带来了更加尖锐和丰富的体验与写作资源。这种资源的优势是别的地方所不具备的，市场将这些异乡的漂泊者吸引到这里，让他们在这里演出人生的悲欢离合、胜败浮沉，让他们在这里感受希望和痛楚，以参与者和见证人的双重身份，记录下一段难忘的人生历史。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样的资本与市场化环境也不只是提供了苦难人生的样本，同时还孕育了思考与书写的真实习惯与自由氛围，给他们的思考与写作预留了最大的可能空间。这在其他地方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丝毫也不奇怪，是这块充满生存的尖锐与利益追逐的地方，最先生发出强烈的伦理呼喊，冒出了关注打工者生存处境与精神世界的吁请。而这样的观念，在北京和上海的“有身

份”的文化界人士的圈子里，却受到了不少人的曲解、抵制和讥讽。

再返回来谈谈北京。从某个方面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也许是文化地理色彩最模糊和含混的城市了，但这也正是它特有的“地理”属性。在这个城市中，本土的文化似乎越来越稀薄了，十年前外地人来到北京，耳朵中充满的是不无傲慢、不由分说、不容争辩的字正腔圆的老北京话，而今这种声音据说在三环路以内已经很少听见了，“老北京”的文化正在为一个兼容和多样的复合文化结构所取代。这样，作为一种文化地理范畴的“北京诗歌”，便具有了一种特别混杂和包容的特点，这种混杂在外省是很难想象的。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诗歌聚会上，人们会看到多年前漂泊“江湖”的各路各派的诗人的身影，他们中有的已是腰缠万贯的书商、画家、公司老板、IT产业者、电视制片人，有的是混迹三教九流，比较“落魄”或者完全能够糊口果腹的打工者、小商人、自由写作者，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游手好闲之徒……但凭着一个诗歌的名义和“诗人身份”，他们可以同时出入于各种文化场合、诗歌朗诵会、豪华饭店或者路边小酒馆里，可以推杯换盏、呼兄道弟、出口骂娘甚至大打出手，随后又油嘴一抹消失在潮涌一样的人群里。这样一个情况大概除了在北京，在任何一个别的省份都不会如此夸张。而且，北京的文化环境还会使一个诗人的性格发生显著变化，在我印象中，外地一些原本曾矜持“老实”的诗人来京后迅即改换了做派，一如庄子所说的急谋斗升之水相濡以沫的“涸辙之鲋”，那原是小水汪中的生存之道与交往伦理，而到了北京之后，则免不了是鱼入大海，“相忘于江湖”。这样深阔的文化空间，使北京所形成的诗人群落就不是一个一个的“现代主义的山头”，而更多的是平面化的“后现代的混合状态”。

如果要刻意观察“北京和外省”这样两个相对意义上的地理概念的话，在诗歌写作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细微差别——这样说当

然是简单化的以偏概全，但宏观上仍然可以说出某些差异：混迹北京的诗人最注重的是对旗帜的标榜，以及各种形式的实验，这是由于知识信息的迅捷与庞杂所决定的，因此我前文所说的“极限文本”多半出在北京，“笔墨官司”也多与北京地界上的诗人有关；如果说外省的诗人可能更注重抒情或者写作的道义性担当，那么北京的诗人在我看来则最注重形式的实验与探求；如果说外省的诗人有更多“前现代的焦虑”与精神性追求的话，那么北京的诗人则有更多“后现代的智性”与技术趣味。这当然是武断的说法——北京自然也不乏有坚持精神性追求的诗人，但我说的是一种总体的氛围。以2007年问世的《卡丘主义创刊号》为例，我以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意味的文本，这样一本诗歌民刊似乎不大可能出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上海的《活塞》在视觉上也给了我以强烈的“后现代式”的震撼，但那是由“鬼魂”与“幽灵”的图画构成的一种荒诞感，而《卡丘主义创刊号》则拼贴了大量革命和“文革”时代的影像符号，它用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画，以强烈的“间离”效果呈现了我们的文化失忆或记忆的碎片感。但是显然，它已不是追求“政治波谱”的效果，而只是作用于消费时代的一般性文化感受而已。

“卡丘主义”在文化与美学上都具有十足的兼容性与含混性，它一下子推出了三个“宣言”，这些宣言的文字很繁复且很有意味，但读完则使人陷入了茫然。这种迷失感使我不得不放弃试图“理解”和诠释它的冲动——

卡丘主义者认为，卡丘是一场自觉自愿的文化、艺术、流派的运动，也是“反对”文化、艺术、流派的运动。卡丘相信诗歌和艺术的一切，卡丘包容一切，卡丘是人类内心的运动，卡丘必须成为一切“有必要活着”的诗歌、艺术和写作的疆域拓展者，卡丘是整合一切精神资源的探索狂的代名词。卡丘不是要得到什么，不是要成为什么，卡丘是要“从

结果回到资源”的诗歌运动，从诗歌的表现形式回到诗歌的本质的运动，从写作者回到读者的运动，从读诗者回到高兴者、有趣者的诗歌运动，卡丘是从疯狂回到宁静、再从宁静来到更疯狂的螺旋上升的运动……^①

既“包容一切”又两可之间，几乎可以成为这种“卡丘美学”的简化版本，平静中的游戏，含混中的不同与趋同，诙谐中的严肃意味，这是只有北京才会具备的驳杂和多元。

上述情形也显然只是北京文化地理的一个侧面，只有出席了“中坤国际诗歌奖暨帕米尔研究院”的成立仪式，才会真正知道2007年的北京作为“国际化都市”的内涵。如果说一年多以前诗人兼房地产企业家黄怒波设立总额达三千万元人民币的“中坤诗歌基金”（分别投给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中国诗歌学会、诗人批评家唐晓渡和西川领导的帕米尔工作室）已足以令人吃惊的话，那么把一个诗歌奖项颁发给国际著名的诗人与翻译家，则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化与诗歌艺术的一个新的时代。这绝不是夸张之辞，民间经济力量已经可以影响到中外文化与艺术的交流方式，这在过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这里让我摘录一段来自新浪网的报道：

2007年11月12日，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成立仪式在金秋时节的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首都文学、艺术、新闻等各界著名人士、部分驻华使馆和文化机构的有关官员等300余人出席了此次盛会。

在精彩的大提琴演奏之后，程序进入了典礼的重头戏——诗歌奖的颁奖单元。颁奖依A、B、C三个奖项的顺

^① 朱鹰、周瑟瑟：《卡丘主义宣言二号》，见《卡丘主义创刊号》2007年。

序进行，由著名诗人芒克、牛汉，北京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著名诗歌学者谢冕分别为获奖的中国诗人翟永明、法国诗人博纳富瓦、中国翻译家绿原和德国汉学家顾彬颁奖，其中博纳富瓦先生因腿疾不能亲临现场，他对此深表遗憾，并委托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柯蓉代为领奖，还寄来了专门制作的影像资料……^①

外省的诗人在过去没少为自己经典化的程度、所获得的承认度而感到愤愤不平，但如果他出席一次这样的场合便会改变看法——这就是北京，只有在北京才会有这样的资源、平台和交流机遇。虽然一个足够自信的诗人也可以坚持认为，这与一个诗人最终的成就与成色没多大关系，但在这资讯爆炸与信息消费的时代，谁又敢说真的一点关系没有呢？

三 写作权利与秩序重建

诗歌界 2006 年的喧嚣，引发了人们在 2007 年的思考，关于写作的权利与网络媒介中的文本性质、关于诗歌品质的判断与秩序重建的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但问题显然不是新出现的，在最近几年中这方面的讨论已有很多，只是在“个人权利”与“总体标准”之间一直没有建立其有效的对接关系。2007 年上半年，我在访谈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家柯雷教授时曾问他，在他们那里的网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会像我们这里一样暴力化吗，他说骂人的情况总会有，“但不会像你们这样过分”——他这个回答让我一时语塞，但确没有出乎我的预料。我想这个问题同社会领域中的弊政是一样的，争取权利当然是第一重要的，但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权利也同样需要得到限制，如果不能，“权利”

^① http://www.wenhuacn.com/news_article.asp?classid=31&newsid=6651

就会异化为“权力”甚至“暴力”，最终也将无法得到保护。

这就如同人的社会权利一样，是需要一种“契约”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梭式的“二律悖反”理论和“社会契约说”仍然是值得借鉴的。“自由与权威”、“个体与社会（人和公民）”、“欲望和理性”，必须是通过互相制约依存、通过公共契约的形式来确立的。现代以来人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基本规则和理论的正确。如果两者不能同时互为前提地得到合法保障，便不能维持基本的人类文明。“文革”早已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一些人的言论与人身自由是以牺牲另一些人的言论与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那么这种自由便是伪自由，便是可怕的“集体的专制”，这种“自由的主体”很容易便蜕变成了“暴民”。网络环境下的言论暴力，虽然不至于使被施暴者像“文革”中那样直接受到身体的伤害，但长远看，如果公众都不去遵守这个契约，那么网络环境下的文化秩序和写作伦理便无法建立。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说话者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样的环境会产生积极和进步的文化吗？会产生有意义的写作吗？因此，必须使每一个人都懂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样一个文明规则，这不仅仅是捍卫别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同时保障了自己的权利，因为卢梭说得好——“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实质上“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这才是“契约”。

但对网络写作还要做区别分析，要将“一般的言论发表”与“写作”特别是狭义的“文学写作”区分开来，目前真正的“网络写作”——指在网络环境下的原创性写作，即直接面向网络世界、符合网络传播风格、在网络平台走红、然后旁及其他媒介的写作——发育并不充分，作品并不是很多，只有诗歌算是一个例外，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特意搜索了几个大的文学网站，以“诗生活”[<http://www.poemlife.com>]为例，在这上面发表的诗歌作品大都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有相当的质量。翻看另一些比较“底线”的网站，我发现它们也不像前几年那么乱、那么闹和那

么粗暴了。我举出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也许有助于“反证”这一点。这是我从网上搜出的“垃圾派”代表人物徐乡愁的一首张贴在“诗歌报论坛”[<http://www.shigebao.com.cn/index.php>]上的诗：题目叫做《我的垃圾人生》：“我的理想就是考不上大学/即使考上了也拿不到毕业证/即使拿到了也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了也会得罪领导/我的理想就是被单位开除/我的理想就是到街上去流浪/且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精神猥琐目光呆滞/招干的来了不去应聘/招兵的来了不去应征/我一无所有家徒四壁/过了而立还讨不上老婆”——

我的理想就是不给祖国繁衍后代
我的理想就是把自己的腿整瘸
一颠一拐地走过时代广场
我的理想就是天生一双对眼
看问题总向鼻梁的中央集中
我的理想就是患上癫痫
你们把我送去救护
我却向你们口吐泡沫

从道德和字面意义上看，这无疑是“底线以下”的写作了，但如果你是在一个敏感的语境中来理解它的，也会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并不仅仅是让你“受不了”的恶劣与坏，你会从中读出一点点不平之气，对于我们这个充满问题的社会来说，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大约也包含了某种反讽的意味。我不知道这首分行文字是否可以算做典型的“网络写作”，但可以用“排除法”，因为这样的写作在“纸媒”环境下显然很难“发表”，而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环境之上。这表明网络环境确有比纸媒与其他环境更宽松、其伦理标准更“底线”的特点。

但是这样的写作如果严格按照文学和诗的标准来衡量，又只